

杰斐逊的政党思想与实践

宋 腊 梅

[摘 要] 杰斐逊的政党思想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先是厌恶政党,继之组建政党,再之调和两党,最后坚称两党不可融合。杰斐逊的政党思想与实践之所以复杂多变,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复杂的人物,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政治斗争的激烈与复杂。此外,从其变化经历中,我们还可大致看出反政党时代的人们接受政党这一新生事物的过程。

[关键词] 杰斐逊;政党思想;政党实践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5-0681-07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著名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是一位复杂的人物,必须既分析其思想,又分析其行动”^[1](第 25 页),霍夫施塔特如是说。这话用在分析杰斐逊关于政党的问题上也是合适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他作出全面评价。在论述其政党思想与实践之前,简单地罗列起公职生活非常有必要,因为他的政党思想与他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或者说,他的政治生活是他的政党思想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1785—1789 年,他任美国驻法国公使;1790—1793 年,任华盛顿总统的国务卿;1801—1809 年,任美国总统。此后,卸任公职,回到家乡过着宁静生活。与上述经历相一致,杰斐逊的政党思想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变化巨大的四个阶段:始之厌恶政党——宣称“如果我除非加入一个党就进不了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2](第 436 页);继之组建政党并成为党的领袖;再之调和两党——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2](第 306 页);最后宣称政党具有原则差别,不可调和——“事实上,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既属于国家史,也属于文明史”^[2](第 595 页)。下面就以其政治活动为线索,勾勒杰斐逊政党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试图探寻政党的源头。

一、厌恶政党

在围绕是否批准 1787 年宪法的斗争中,美国大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赞成,自称联邦主义者;一种反对,被称为反联邦主义者。杰斐逊是如何看待两派的呢?

(一)不完全同意联邦主义者的观点

美国国内的这场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杰斐逊正担任驻法公使。他密切关注着这部宪法的命运,并对该宪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张好画,只有几个地方需要润色。”^[2](第 427 页)哪几个地方呢?第一,缺少权利法案;第二,反对总统连任。杰斐逊认为新宪法之所以存在上述缺陷,是因为他极力坚持:第一,“一切政府的惟一目的是维护人的权利;为了不断提醒政府这个目的,宪法一开始应有一个关于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宣言。”^[2](第 453 页)第二,至于总统连任,理智告诉他,“可以多次连任的行政首脑等于是终身任职。当一、两代人证明这是一个终身职位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为它要阴谋、行贿、使用暴力,甚至值得外国进行干涉”^[2](第 412 页),这对于特别喜爱共和制、特别憎恨君主制的杰斐逊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总之,由于他并不完全赞成新宪法,所以他认为自己不是联邦主义者。

(二)与反联邦主义者分歧更大

杰斐逊也不属于反联邦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离反联邦主义者那个派别更远”^[3](第410页)。在制宪会议上,梅森、伦道夫和格里都认为宪法存在诸多问题——反对宪法的健将梅森——指出宪法存在的缺陷:缺少公民权利宣言、参议院和联邦总统权力太大、各邦政府受到限制等;伦道夫和格里也认为宪法存在着赋予联邦议会权力太大等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再开一次制宪会议作出最后决定^[4](第761-773页)——因而都拒绝在宪法上签名。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正当汉密尔顿等人为争取宪法得到民众批准而大声呼吁时,乔治·梅森和帕特里克·亨利等却以宪法缺少权利法案为由领导反联邦主义者攻击宪法,想藉此击败宪法,使之得不到民众批准。与上述反联邦主义者不同,杰斐逊同宪法制订者的分歧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他不仅不反对批准新宪法,甚至还担心因反对新宪法而导致联邦分裂。他相信宪法能使人民和他们的地方政府团结起来,这就使他对联邦主义者比对反联邦主义者更加亲近。

(三)厌恶党争

此时的杰斐逊远在法国,没有被卷进激烈论战的现场,颇有旁观者清的味道,故宣称:“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派别,也不是两个派别之间的骑墙者。”^[3](第411页)另外,鉴于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激烈论战有可能导致新宪法不被通过、从而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时,他对党争表现出了极端的厌恶之情:“只要我能够进行独立思考,我从来不使我的见解受任何一帮人的信条的支配……如果我除非加入一个党就进不了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

二、组建政党

(一)与汉密尔顿的冲突愈演愈烈

由于政见不同,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内阁中的冲突愈演愈烈,“天天在内阁里斗,像两只公鸡一样”^[5](第476页);假如杰斐逊说,“这是黑的,先生”,汉密尔顿就说,“这是白的”^[6](第25页)两人之间的冲突如此严重,以至于华盛顿不得不分别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各自“都抛弃伤人的猜疑和刺激性的指责,而代之以胸怀宽大的忍让、互相克制和妥协”^[7](第276页)。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政见不同,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政治上,杰斐逊崇尚民主,厌恶君主制和世袭制,主张扩大州权;汉密尔顿则醉心贵族政治,推崇君主制,主张中央集权。经济战略上,杰斐逊力主农业立国,汉密尔顿则主张工商立国^[8](第126-141页)。外交上,杰斐逊亲法,汉密尔顿则亲英。

尽管杰斐逊在后来的岁月里回忆他当时与汉密尔顿的斗争是“拥护共和政体与拥护君主政体的人们之间的原则斗争”^[2](第127页)。可是,仔细分析具体原因,就会发现引起他们二人冲突的并不是政体原则的斗争;也就是说,抽象原则上的分歧即使再激烈和尖锐,如果没有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不会达到对抗的程度。联邦政府成立之初,汉密尔顿主持制订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抛开制订这些法案的动机不论,这些法案事实上有利于北部工商业集团,不利于甚至有损于南部种植园主联盟,所以南北两派势力分别聚集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周围,他们二人也就不知不觉地、被动地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

(二)寻求华盛顿的理解与支持

为了打败汉密尔顿,杰斐逊首先依靠的是华盛顿。他于1792年5月23日给华盛顿写信,谈到了汉密尔顿的措施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把目前的共和政体变成以英国宪法为楷模的君主政体铺平道路”^[2](第483页)。华盛顿公正无私——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华盛顿热切希望他能“更多地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行为”^[7](第275页),能对某些设想的正确性进行实验之后才加以判断;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他虽肯定“政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不可少的”^[7](第276页),但是,他仍希望汉密尔顿能宽大为怀地对待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在行动中能与他们协调一致。华盛顿的不偏不倚,在杰斐逊看来,主要是由于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阴谋的动向或者作用不了解,对财政计划、计算和预算不熟悉”^[2](第134页)造成的,所以在1792年9月9日的信中,他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导致政府发生倾轧的原因——汉密尔

顿的方案的目的“是他的部门支配国会议员,借以挖共和国的墙脚,把共和国颠覆”^[2](第488页)。这一次,华盛顿郑重向他声明:“我坚信二公见地均出自纯正及良好的用心,而争论的症结仅在于何种措施较为优越,这只能由实践予以验证。”^[7](第282页)

(三)创办报纸

眼见争取华盛顿的支持无望,要想战胜汉密尔顿,必须另想别的办法。首先,必须揭露汉密尔顿们的“阴谋”,公开自己的共和思想,以此诉诸于人民,让人民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报纸就是武器”^[9](第319页),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办报。该报就是弗里诺的《国民报》。除杰斐逊提出或赞同的措施外,政府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它攻击的对象,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更不能例外。

从表面上看,杰斐逊与《国民报》没什么关系,弗里诺只是他聘请的办公室的外文秘书,杰斐逊本人也未曾给该报撰写过一行字,可是,正如《杰斐逊评传》的作者吉尔贝·希纳尔所言,“弗里诺的报纸就是杰斐逊的报纸,所有文章犹如国务卿所撰写,全部股份犹如国务卿一人所拥有”^[9](第242页),因为,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停止对汉密尔顿的一切攻击!虽然小诺布尔·E.坎宁安认为杰斐逊当时就想创办一份党报的证据不足,但是,他肯定《国民报》的创办的确为导致双方的支持者在全国政治问题上分成两大阵营的那些力量和条件提供了推动力^[10](第24页)。

(四)组建政党

要想彻底战胜汉密尔顿,光办报还不够,因为国会议员的表决是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能否通过的关键。组建政党团结力量开始提上日程。

政党首先是在国会中形成的。在答复华盛顿要求“忍让、克制和妥协”的信中,汉密尔顿写道,“我知道,从杰斐逊先生到纽约市担任现任职务时起,我就一直是他始终反对的目标。……我很早就看出,在他的发起下立法机关中形成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一心要把我搞垮。”^[10](第24-25页)杰斐逊自己也说,“克服我们现有政体中腐败现象的唯一办法是增加下议院的人数,使农业方面的代表增多,这将会使这方面的利益超过股票经纪人的利益。”^[9](第231页)虽然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斗争是在内阁中进行的,但是,双方政策的推行却要靠国会议员的投票决定。所以,为政党组织机构的发展打下基础的主要还是国会中共和党集团和联邦党集团的形成。1791年10月到1792年5月的众议院议员的投票记录表明,在一个有65名议员的众议院里,有17名议员在23次表决中总是与麦迪逊投相同的票,大约半数的议员始终保持中立^[11](第141页)。两党首先在国会中形成,之后就开始走向国会之外,广大选民最后也因选举国会议员而按国会中的党派分别站队,国会政党逐渐转变为全国性政党。

有人说共和党的领导人对政党的建立没有完全的认识,这也许是对的,但要说没有一点认识,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可从他们两人的著述及态度中看出来。麦迪逊于1792年在《国民报》上相继发表了几篇有关政党的文章,如1月23日的《论政党》^[12](第504-505页)、9月26日的《政党的实际情形》^[12](第530-532页)、12月22日的《谁是人民自由的最好守护者》^[12](第532-534页),阐述了有关政党的一系列思想。《论政党》一文开宗明义就讲:在每个政治社会中,政党是不可避免的;利益上的不同,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推测的,是导致政党产生的最自然和最有效的原因。相较而言,这一时期杰斐逊对政党的论述要少得多。从现存资料来看,杰斐逊仅在1792年6月29日致麦迪逊的信中表达过对汉密尔顿居然敢把共和党称作是“一个派别”的愤怒。然而,它所体现的意义却不可小觑。在此之前,“政党”与“派别”这两个术语多多少少都是交替使用的,杰斐逊在这里把“政党”与“派别”作了重要区分,这标志着“政党”概念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3](第408页)。

(五)成为党的领袖

麦迪逊在共和党的形成过程中做过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如:在国会里领导共和党核心小组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积极推动弗里诺主编《国民报》,在1792年选举中推动共和党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等。但是,被公认为共和党领袖的却不是他,而是杰斐逊。这是因为:第一,杰斐逊领导着国会中的共和党势力并为他们出谋划策。1793年8月,他就共和党的策略问题写信给麦迪逊说:“我认为,共和

党在国会中这样做是明智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从而使人民站在我们的一边。”^[10](第29页)小诺布尔·E.坎宁安认为该引文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显示了杰斐逊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身份。它表明杰斐逊在为党的政策提出建议,从党的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共和党能否保持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操心。第二,杰斐逊是共和党的精神领袖,共和党形成和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的精神感召。他自己却在与亚当斯的通信中把它解释为,“由于我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比其他大多数人都长,国人对我们的名字也更熟悉,结果那个认为你和他们想法相同的党把你的名字列在他们的首位,另一个党,出于同样原因,选中了我。”^[2](第596页)

三、调和两党

(一)为共和党制定纲领

1799年1月26日,杰斐逊向埃尔布里奇·格里写了一封信,详细阐明他的原则:维护联邦宪法,维护宪法要按照各州通过它时所领会的真正意义;赞成各州未交给联邦的权力由各州保留;赞成一个极其精简和俭朴的政府;赞成在敌人真正入侵前完全依靠民兵,赞成建立一支仅限于能够保卫其海岸和港口的海军;赞成与所有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政治上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结盟,外交机构少设立或不设立;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赞成言论出版自由;赞成鼓励一切科学部门向前发展等。上述原则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纲领,是迄至那时为止对杰斐逊学说所作的最明白易懂的说明”^[9](第317页)。

(二)动员共和党为1800年的大选积极做准备

为迎接1800年的总统选举,杰斐逊敦促共和党发言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支持党。早在1799年初,他就写信给麦迪逊说:即将来临的夏天将是“要付出巨大精力和牺牲的时节。发动机就是报纸。每个人都必须以他的钱袋和笔杆子作出贡献”^[10](第40页)。他不匿名给报纸写稿,却鼓励别人这样做。1799年,他送给弗吉尼亚州的门罗12份政治小册子,请他散发到能起作用的地方。1800年,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把96份托马斯·库珀的《政治算术》送给共和党弗吉尼亚州委员会主席,并指示他给州的每个县委员会送一份。他在信中说,“这些小册子是从我这里发出的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会很容易地看到,由我来宣传这些小册子,将会给人以什么样的把柄。因此,我必须留给你自己去解释这些小册子是怎样到你手中的。”^[10](第41页)虽然他没有公开竞选总统职位,但是他确实为共和党出了力。最后,共和党在这位具有非凡精明和智慧的政治天才的带领下,一举击败其对手,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由执政党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

(三)艰难获胜——经过众议院一星期36轮投票才选出的总统

1800年12月底,选举结果为:杰斐逊与伯尔均获73票。在以后众议院的多次投票中,均无人胜出,选举陷入僵局。在这个关键时刻,汉密尔顿发挥了巨大作用,用杰斐逊自己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正在使用他的最大的影响使我当选而不让伯尔上校当选。”^[2](第528页)汉密尔顿曾在内阁中与杰斐逊斗得死去活来,这时却选择帮助他而不是伯尔,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伯尔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汉密尔顿非常了解杰斐逊,推断他上台后所采取的政策将不致有彻底的颠覆。事实证明汉密尔顿的判断是对的,杰斐逊上台后采取的政策同联邦党人的政策相去并不甚远,连他本人也承认,“决无法挣脱他(指汉密尔顿)所建立的金融制度”^[1](第35页)。由于汉密尔顿等的努力,选举出现了有利于杰斐逊的变化,最后,他获得胜利,成为美国总统,然而,他的获胜却是异常艰难的——经过了众议院一星期36轮的投票!

(四)试图融合两党

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一些较天真的联邦党人深感惊恐。费希尔·埃姆斯甚至预言他很快将闻到“祭坛上人类供品令人恶心的汗气”^[1](第33页)。1801年3月,艰难获胜的杰斐逊发表就职演说,对惊恐的联邦党人伸去橄榄枝,并安抚他们说,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是原则相同的兄弟,只是称呼不同罢了。

党派纷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杰斐逊就作出上述改变,原因为何?仔细分析,至少可看出以下几点:第

一,在选举的艰难时刻,正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帮助他,他才成为总统的。对刚帮助过他的联邦党人,是没有理由马上挥舞大棒的。第二,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即作为联邦总统而不只是某一政党领袖,他有责任弥合党派分歧,团结全国力量。因此,把过去的仇恨化为烟云,在公民中恢复融洽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是他在政治中采取的和解策略,同时,这也是他的愿望和努力的目标。1801年,他写道,“我希望不久就能看到一个完全的联合,除了不能放弃我们革命的各项原则之外,我将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12](第529页)

四、坚称两党不可融合

(一)政党因原则差别而天生

政党是怎么产生的?卸任公职后的杰斐逊一改总统任上的“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的论调,转而宣称共和、联邦两党是天生的,具有原则性差别,不可融合。

1813年,他写信给梅利什,详细区分了美国两党的差别,并得出结论说,每个政党都竭力争取执掌政权,把另一个政党排除在权力之外,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只是导致政党产生的次要动机,主要动机则是政治原则的实质性差别——即“君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何者占优的问题长时期使别处的人们分裂,也势必要使这儿的人永远分裂”^[12](第589页)。同年,他在致亚当斯的信中再次阐述了同样思想:“事实上,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既属于国家史,也属于文明史。”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杰斐逊认为美国两党的产生与原则有关,而与个人关系不大。在美国考察过9个多月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几乎把杰斐逊的话重复地表达了一遍。他说,在不同的社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并被冠以不同名称的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限制人民的权力,另一种希望无限扩大人民的权力——与世界同样古老^[13](第197页)。当今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假如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汉密尔顿这个人,那也仍会有联邦主义这种信仰;假如杰斐逊作为驻法国的公使而度过他的一生,那也仍会出现一个反对派”^[16](第25页)。

共和、联邦两党因原则差别而天生,因此不可融合,这是杰斐逊后期坚信不移的观念。即使在19世纪2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共和、联邦两党不再有任何差别,也就是两党已大致融合时,杰斐逊却说融合的仅是政党名称,而不是原则^[13](第449页)。杰斐逊对政党原则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政党作用独特

对于政党的作用,杰斐逊论述得较少,但可贵的是,经过多年的政党斗争,他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独到见解,这对日后政党的发展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党派是相互行为的监察员,公众的有用的警卫员”,因此,他反对合并政党,“我不主张把许多党合并为一个,这既不合乎理想,对公众也没有好处”^[12](第681页)。另外,他还认为政治上的分歧只应停留在政治上,不应该进入社会圈子,也不应该破坏社会的友谊、善行或正义。这实际上是为政党斗争的范围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以及为政党斗争的游戏厘定了一个大致的规则。

五、结 语

(一)杰斐逊的政党思想与实践并不矛盾

在杰斐逊的一生中,其政党思想与实践不断变化,始则厌恶政党,继之组建政党,然后宣称两党是兄弟,并无原则冲突,最后又说两党具有原则性差别,不可融合。表面看来,其政党思想多变,互相矛盾,连梅里亚姆也说,“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存在着矛盾。杰斐逊作为政治学家的理论与杰斐逊作为实干家的实践并不是永远一致的。”^[14](第83页)但是,仔细分析,却正好可以看出反政党时代的人们接受政党这一新生事物的过程以及政党起源的过程。

政党开始形成时期,人们认为政党互相倾轧,导致社会分裂,是个祸害。“公共利益被两个在人数上几乎势均力敌的政党所操纵,这种局面必然是极端危险的。事物不应分裂成相互冲突的几部分,而是要

团结一致,这才是真理。”^[10](第20页)这种想法在18世纪前的美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由于大众对政党的抵触情绪强烈,故政党每向前发展一步几乎都要遭到非议。杰斐逊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从他这时的一句名言——“如果我除非加入一个党就进不了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天堂”就可看出他厌恶党争到了何种程度!可是,随着他逐渐成为政治斗争舞台的主角,他就发现政党也是一个具有利弊的东西,即不仅有互相倾轧导致祸害社会的一面,同时,也可藉互相监察对方而成为守护社会的警卫员。因此,为着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开始与麦迪逊一道组建反对党。1801年成为总统后,宣称两党并无原则区别,这只不过是他因应联合全国各种势力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罢了,等他一卸任公职,马上就说两党是因原则差别而天生的党,不可融合,也不需要融合,并且此后一直坚持此观念,不再改变。

杰斐逊在政党问题上的言行不一和复杂多变,实际上可看作是政党如何进入现代政治生活、人们如何接受政党的一个过程的缩影。政党的出现虽然不可避免,但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却需要时间。尽管如此,作为宪政制度安排之外的政党仍然顽强地生长起来,并与宪政制度一起推动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二)杰斐逊的党与联邦党的分野是两类财产观的分野

杰斐逊声称他的党是热爱人民的党,因此,他的党与联邦党的斗争是热爱人民的人同不信任人民的人之间的斗争。对于杰斐逊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但是,对于他所领导的党的性质,却有人表示出不同看法。杰斐逊所领导的共和党,尽管反对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联邦党,但其本身却不是没有财产要求的政党,相反,自耕农和大种植园主也是属于有贪婪要求的有产者,故在此套用霍夫施塔特的话说,“虽然具有民主头脑的美国人的确站在杰斐逊一边,但(共和、联邦两党的)分界线本质上却在两类财产之间,而不是在两种理论之间。”^[15](第40-41页)

(三)杰斐逊对政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杰斐逊对政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现代的大众的政党,同时也是负责任的合宪的反对党——任何人仅取得该项成就,就足够为他的墓碑增辉添彩!^[16](第67-68页)共和党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1800年大选的胜利,全国政府的政权第一次从执政党手中和平地——通过把共和党的政纲诉诸公众而击败联邦党^[17](第29页)——转移到反对党手中。此举意义重大,不可小觑,因为它为现代政党的文明竞争树立了榜样。

第二,开创了政党办报的先例。有人认为,把报纸用在政治上的第一个党就是杰斐逊的共和党。18世纪90年代,美国两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报纸网络,宣传两党各自的政见,批评对方的主张,这样,报纸既成为了政党内部交流的媒体,也充当了政党之间斗争的武器。

第三,传递了总统应超越于党派之上的理念。杰斐逊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上宣扬“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时,不仅有弥合分歧团结两党的愿望和策略,同时也表明作为一国总统有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天然职责,即总统是美国的总统,而非某一政党的总统。尽管事实上不一定做得到,但其理论则是合乎逻辑的。

第四,刷新了有关政党的各种观念。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从18世纪末期的哲学传统中几乎找不到谈论政党的满意话语。换句话说,18世纪的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反政党的时代,“如果深入考察政党在十八世纪英美思想中的地位,我们就会发现,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政党是祸害。”^[16](第69页)1738年,博林布鲁克在《一个爱国国王的理念》中写道:“政党是政治祸害,而宗派则是所有政党中最坏者。”^[18](第257页)比他稍晚出生的休谟在论及派别时,口吻几无变化,认为它“颠覆政府,使法律失效,并在同一国家的人们中间造成最强烈的敌意”^[19](第34页)。人们普遍担心政党将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从而阻挠国家的一致^[20](第9页)。但是,经历过种种残酷政治斗争的杰斐逊却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政治原则的差别导致了政党的产生,因此,政党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政党的作用独特——是相互行为的监察员和公众的有用的警卫员,因此政党不必融合。最后,在他的领导下,政权的成功转移也使得两党好过一党或者无党的观念开始在人们心中发芽、扎根。

[参 考 文 献]

- [1]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 [2] [美] 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3] Appleby, Joyce & Terence Ball. 2003. *Jefferson Political Writings*.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 [4] [美]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册,尹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5] [美] 华盛顿·欧文:《华盛顿》,张今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年版。
- [6] [美]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共和党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7] [美] 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 [8] 张少华:《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载《历史研究》1994 年第 6 期。
- [9] [美] 吉尔贝·希纳尔:《杰斐逊评传》,王丽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10] [美]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11] 刘祚昌:《杰斐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 [12] Rakove, Jack N. 1999. *James Madison Writing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 [13]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 [14] [美]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 [15] Hofstadter, Richard. 1973.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16] Chamber, William Nisbet. 1972. *The First Party System: Federalists and Republica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17] [意] 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 [18] Armitage, David. 2003. *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 [19] Haakonssen, Knud. 2003. *Hume Political Essays*.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 [20] Hoadlev, John F. 1986.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789—1803*. Lexington, Kv.: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21] [美] 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传》,朱士清、高雨洁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omas Jefferson: Thought & Practice of Political Party

Song Lamei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From disliking political party to founding political party, and from reconciling two parties to persisting in that amalga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was impossible, Jefferson'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party went through the above four periods of evolvement. Jefferson'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party was complicated, because he was a complex person, and more importantly, political struggle was intense and intricate. In addition, Jefferson's experience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man's identifying with political party.

Key words: Thomas Jefferson; political party thought; political party practice